

梁 鸿 编著

阎连科文学年谱



阎连科文学年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阎连科文学年谱/梁鸿编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 当代著名作家系列)]

ISBN 978-7-309-11026-5

I. 阎… II. 梁… III. 阎连科-文学研究-年谱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0597 号

阎连科文学年谱

梁 鸿 编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84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026-5/I · 866

定价: 2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陈思和

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日，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

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后来章先生指导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学，也是先从研究作家着手，而研究作家先要从编撰年谱着手，于是就有了一套题为《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的年谱系列，这套书至今仍是我最珍爱的藏书之一。

章培恒先生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曾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过陈寅恪、梁启超等名师指点，蒋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许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遗著。一套书干干净净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蒋先生编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用年谱形式，把陈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动都保存下来，没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来谬托陈先生知己的学人名流有的是，却没有一个在陈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时候“独来南海吊残秋”的。这些流传在复旦校园里的故事，既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倒也不是说，做年谱就是有学问，大谈理论就不是真学问。章先生后来也是从史料考辨走出来，偏重学理史识，成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们从蒋先生

到章先生再到章门弟子的传承中可以看到,编制编年事辑(年谱)成为他们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古代文学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随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从搜集的大量资料中编撰一份“外来思潮、流派和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1900—1927)”的大事年表,罗列西方诸思潮流派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编年记录;这份年表有六万多字,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关系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来我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使用的材料观点,基本上得益于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培养研究生治学研究,从作家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起步,收集资料,编撰年谱或者编年事辑,是最好的训练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都由此而生;为后来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绕不过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这种扎实的学术风气,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渐渐式微,一些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流行理论、外来术语、教条形式都开始泛滥,搞乱了青年学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坏了良好求实的学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严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学院,担纲校特聘教授与《东吴学术》执行主编。

林先生从事文学编辑三十余年,对于学界时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编撰当代作家、学者年谱,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作家、学者的详细年谱,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信史。我赞成他的提倡,这个建议不仅有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夯实,也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学风培养开拓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乙种:当代著名学者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这套丛书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够坚持若干年,不断开拓选题,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4年4月19日写于鱼焦了斋

一九五八年

出生年。

八月二十四日，阎连科出生于河南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田湖村。

这一出生年月并不完全确定，“因为家里贫寒，从小一家人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谁都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①。阎连科二十周岁当兵时，去大队会计处查户口，发现户口登记簿上只有他的名字，没有出生年月日，此时，对于时间只有与农事相关方有更深记忆的母亲说：“连科出生那年红薯特别丰收，家家为了大跃进顾不上去刨红薯，结果红薯都烂在田地里。”大队会计说：“那是一九五八年。”母亲说：“生他时天气特别热。”大队会计说：“那就八月吧。”

大队会计在户口登记簿上补写了“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从此，阎连科的出生时间就是这个日期了。

在他的家乡田湖以南二里处，耙耧山脉从远处延伸

^①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而来，和许多岭梁连接为绵延丘陵，这丘陵遥遥相对着伏牛山脉，中间是宽阔的、深深的谷沟，有伊河从山下流过，田湖村的居民就集中居住在这河边岭下。阎连科在这里度过了艰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目睹、经历了中国农村、农民的悲喜人生。“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村镇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

在离田湖镇不远的地方，是东方理学大师程颐、程颢的故里，至今仍有一座纪念他们的寺庙。这座寺庙在作家的少年时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后者只知道“程寺”在“文革”中被人打砸。直到有一天，当他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脉”之间时，“程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才一点点清晰起来。《两程故里》、“瑶沟系列”、《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黄金洞》、《耙耧天歌》、《风雅颂》、《炸裂志》等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化逻辑与象征都与这“寺庙”有着深刻的联系。

^①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18页。

一九六〇年

两岁。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阎连科一家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和贫穷中。“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唤叫着饥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①还有就是对身体疼痛的感知。“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②这给阎连科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一九六五年

七岁。

入田湖小学。学校是一座旧庙，在田湖村北，这在阎

①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 阎连科：《没有边界的跨越：阎连科散文》，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连科的散文名篇《我与父辈》和《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中都有清晰、详细的描写。但这一入学时间，也是大致的推算，父母亲对此并没有准确的记忆。“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年月公元，村人们也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①

一九六七年

九岁。

全国教育“停课闹革命”，乡村教育完全停滞，上课读书，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和学习“最高指示”。“在那个年代读书，有二年不再升级，二年后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演习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②

① 阎连科：《我与父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2—3页。

一九七二年

十四岁。

就读田湖初中，并开始阅读小说。最初的文学营养是“十七年”革命小说：“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所有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麦秸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①

同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田湖村也有知青到来。每当家里被“派饭”时，母亲都会拿从来舍不得吃的白面、鸡蛋去招待知青。正处于成长时期的阎连科至今仍记得那份渴望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解。而让阎连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起“枪毙”事件：“那一天的黄昏时分，河滩上流动

^①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13页。

着夏天的闷热和潮润的水汽。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寂寞地站在做过刑场而热闹过后的河滩上的一湾空旷里，就在那湾空旷之中，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那些知青，也不再存有仰视和羡慕，而且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如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革命、时代和伟人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①

这是关于知青和知青时代的另外一种叙事，和阿城、王安忆、韩少功等人所描述的知青生活和观察视角完全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文学那里，是苦难人生或血色浪漫，并成为批判荒谬政治文化与启蒙乡村的基本起点，但是，当这一“苦难”“启蒙”与一个乡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时，却呈现出另一种叙事和有限性，历史的被遮蔽与文学史叙述的缝隙被暴露无遗。它或者是一场变相的掠夺，让乡村再次成为供“外来者”索取成长的材料与血液，并且承受着区别对待的命运。

^①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25页。

一九七四年

十六岁。

就读于嵩县四中。入学高中的艰难和痛苦抉择让阎连科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城乡的巨大差别和命运的不公。当时的高中录取政策是城镇户口“必须百分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①。最后,阎连科上了高中,而学习比他好的二姐留在家里成了农民,原因就是“我是男孩”。

一九七五年

十七岁。

读到当代作家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萌发了写作的念头,其中也夹杂着由此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开始偷偷写作长篇小说《山乡血火》。“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

^①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16页。

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的年代，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愿念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觉得，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①

这年夏天，因家里经济困难，阎连科辍学，到河南新乡的一个水泥厂打工。“在家呆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脉上。”^②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阎连科的写作梦想。他又开始动笔写他的长篇小说，这才发现：“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

①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29、31页。

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手指，已经完全弯曲变形，如同树枝一样干枯弯曲，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他说，这时的写作已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在绝望中，“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①。

一九七六年

十八岁。

每天在水泥厂拉板车，运矿石。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两年。“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②

完成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乡血火》，都是些“阶级斗争，地主剥削穷人”的内容。后来，这部小说的命运是

①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母亲把它当烧饭、烤火的火引子给烧了”^①。

一九七七年

十九岁。

家里发来电报让他回家参加高考。“回到家里以后，课本没找齐，复习不到十天，就去参加考试。”^②高考落榜。

一九七八年

二十岁。

继续打工。年底应征入伍。“第一次见到火车，到部队第一次见到电视机，第一次知道小说是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还有刊物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③

①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12页。

②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4页。

③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13页。